

沈丘出土的文物珍品

唐代黄釉乳钉纹豆

豆是古代人们用来盛放调料或肉酱的一种器皿，一般放置在桌面上，相当于今天盘、碟的用途。

1958年4月在沈丘县槐店镇谷河工地施工时发现的黄釉乳钉纹豆是唐代遗物，是同类器物中的精品。其造型高大，整个器物高19.5厘米，口径23.7厘米，底径15.4厘米，重2.5千克。该豆保存完整，形制奇特、优美。深腹，敛口，卷沿圆唇，底部呈喇叭形，实柄较矮，圈足。瓷胎较厚且粗糙。内外饰米黄色釉，外部不到底。盘部以下有聚釉现象，如同烛泪外流，这是在烧制过程中釉在氧化还原时自然下垂形成的。器表有很小的开片，细似冰裂。在黄釉和瓷胎之间还饰有一层很薄的白色护胎釉。豆的腹

部有3层乳钉纹，上层8个乳钉，光滑透亮。中间一层有54个乳钉，排列密集，非常规整。下层有8个乳钉较大，且对称均匀。整个器物胎体厚重，淡雅匀静，古朴端庄自然，尤其是柄部以下的聚釉，宛如少女腮帮上晶莹的泪珠。釉色在阳光或室内灯光的辉映下，七彩缤纷，呈现斑驳陆离的景象，给人以恬静娇美的享受。考古人员根据器物特征判断其为唐代寿州窑作品。

寿州窑窑址分布于安徽省淮南市中区与凤阳县交界的上窑镇一带，窑河、高塘湖沿岸。寿州窑从南朝中晚期开始烧造瓷器，到唐代规模扩大，并形成以烧黄釉瓷为特色的一大名窑，以生产与生活相关的碗、盏、杯、钵、注子等为主。其高档

产品成为当时富贵之家追求的对象。黄釉乳钉纹豆为寿州窑代表作品，能保存到现代实属不易。其造型工艺在唐代瓷器中罕见，具有很高的历史、科学、艺术价值，为国家一级珍贵文物。

沈丘古称寝丘、项，历史悠久，文化灿烂。现今十分发达的餐饮业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。沈丘从三国两晋南北朝到隋朝、唐朝初期的近400年间，一直是豫东、皖北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。其商业经济十分发达，与之相关的餐饮业亦随之兴盛。沈丘出土的黄釉乳钉纹豆证明了这一点。该豆属实用器，其精美的程度不是一般的人所能享用的，属富贵人家所用之物。精美的餐具必须有精美的饮食相匹配。



黄釉乳钉纹豆

从中可看出当时人们对与生活息息相关

的餐饮器具的美好追求。

(李全立 文/图)

小寒·节气

每年1月5日或6日太阳到达黄经285°时为小寒，它与大寒、小暑、大暑及处暑一样，都是表示气温冷暖变化的节气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：“十二月节，月初寒尚小，故云。月半则大矣。”小寒的意思是天气已经很冷，我国大部分地区小寒和大寒期间一般都是最冷的时期，小寒一过，就进入“出门冰上走”的三九天了。

我国古代将小寒分为三候：“一候雁北乡，二候鹊始巢，三候雉始鸣”。古人认为候鸟中大雁是顺阴

阳而迁移，此时阳气已动，所以大雁开始向北迁移。二候时北方到处可见到喜鹊，并且感觉到阳气而开始筑巢。第三候“雉始鸣”的“鸣”为鸣叫的意思，雉在接近四九时会感阳气的生长而鸣叫。

这时北京的平均气温一般在-5℃上下，极端最低温度在-15℃以下；我国东北北部地区此时的平均气温在-30℃左右，午后最高气温平均也不过-20℃，是一个冰雕玉琢的世界；黑龙江、内蒙古和新疆以北的地区及藏北高原，

平均气温在-20℃上下；到秦岭、淮河一线平均气温则在0℃左右，此线以南已经没有季节性的冻土，冬作物也没有明显的越冬期；这时的江南地区平均气温一般在5℃上下，虽然田野里仍是充满生机，但时有冷空气南下，造成一定危害。

小寒时节，除南方地区要注意给小麦、油菜等作物追施冬肥外，海南和华南大部分地区则主要是做好防寒防冻、积肥、施肥和兴修水利等工作。在冬前浇好冻水、施足冬肥、培土壅根的基础上，寒冬季节采用人工

覆盖法也是防御农林作物冻害的重要措施。当寒潮成强冷空气到来之时，泼浇稀粪水，撒施草木灰，可有效地减轻低温对油菜的危害。露地栽培的蔬菜地可用作物秸秆、稻草等稀疏地撒在菜畦上作为冬季长期覆盖物，既不影响光照，又可减小菜株间的风速，阻挡地面热量散失，起到保温防冻的效果。遇到低温来临时再加厚覆盖物作临时性覆盖，低温过后再及时揭去。大棚蔬菜这时要尽量多照阳光，即使有雨雪低温天气，棚外草帘等覆盖物也不可连续多日不揭，以免影响植株正常的光合作用，造成营养缺乏，天晴揭帘时导致植株萎蔫死亡。雪后，应及时摇落果树枝条上的积雪，避免大风造成枝干断裂。

(百度)

篆刻作品



何楠 1979年生于周口，受其家父影响，自幼喜欢书画艺术，先后受教于欧阳中石、王崇仁先生，并得到诸多名家的悉心指导。2005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书法文化研究院。现供职于周口市林业局。

何楠先生的篆刻作品厚重朴实，章法布局新颖独特，视觉效果颇佳。其作品曾多次参加国内外大型展览并获奖，其中有多幅作品刊发于各种报纸、杂志。

周口教育

淮阳县——1928年设立图书馆

上世纪80年代后期编纂的《淮阳县志》表明：县城里曾有一所“崇经义塾”，于清光绪七年(1881年)建造了一座藏书楼，面积约60平方米。就是这座藏书楼，于1928年改为县立中山图书馆，年拨经费120串，归县教育局管理。同时期，国民党县党部也设立了一所向民众开放的图书馆。

淮阳的这两所图书馆，在创立之初就甚为活跃。1929年，河南政治视察团前来视察，称赞中山图书馆“规模宏大，珍藏旧籍颇多，新籍搜罗亦颇宏富”，夸奖县党部图书馆“陈列社会科学书籍颇多，且尚适用”。鉴于该县政府和该县党部对图书馆事务的热情，河南省教育厅在这一年8月制定的《推广河南全省图书馆计划》中，把淮阳列为省垣开封之外拟增设的五所省立图书馆的地点之一(其余四地为洛阳、信阳、汲县、郑县，最终并未实施)。

1929年下半年，该县党部图书馆易名为平民教育馆，主要业务仍是图书借阅。

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前，省督学祁晋卿到淮阳视察，对中山图书馆也甚为欣赏。他说：这所图书馆“地址宽敞适用，清洁整齐”。关于拓展馆务方面，他提出了三条很内行的建议。一是藏书要编号，以“便于检查与保存”。二是图书馆用房要“逐渐扩充”，现有的由藏书楼改建的馆址毕竟显得狭窄。三是管理人员“对于图书馆学亟应加以研究”，以实现各项业务的“以资改进”。

中原大战结束后，淮阳县的中山图书馆又一次得到省督学的赏识。在省教育厅发布的豫东19县的综合评

议中，这所图书馆因“收藏图书颇为宏富”，成为唯一被点名表彰的社会教育机关。

史料显示，当时的淮阳县教育局长王泮成并不满足中山图书馆的一枝独秀，还想在书报借阅事务上实现新的拓展。他在1931年的《教育行政计划书》中提出：这一年，要在城内再添设三处民众图书馆，使四街各有一处，同时采取“由教育局订报，派人管理、公布”的办法，设民众阅报处多处；第二年秋天，还要着手筹办区一级的民众图书馆。

不过，这个一揽子计划中的大多数计划没有完成。1932年的一份《淮阳县教育视察报告》显示，县城和乡间的民众图书馆均未增设，倒是民众阅报处有所起色，中山图书馆又有新的发展。

该报告写道：县教育局投入常年经费1050元，在城内设立七处民众阅报处，由社会教育演讲员李万箱负责分配，尚能逐日张贴，在乡间也设立七处，由区公所负责。

该报告记载：中山图书馆的常年经费已增至1000元(1931年为650元)，设馆长馆员各一人，分藏书室、书籍阅览室二部，内藏书籍一千五百六十一册，共一万零五百九十二册，有报章六种，杂志二十四种。结论是“颇便阅览”。当然，报告也指出这所图书馆存在的不足。主要是“房舍过少，不敷分配”，由此而派生“所有藏书未能悉数陈列，以飨民众”。

不过到了1933年4月，当省督学周祐光再来视察之时，淮阳县已无中山图书馆，却有了民众教育馆。

周口故事

包公受礼“不染泥”

相传宋朝时，有一年淮阳大旱，包拯上陈州访察民情，遂向宋仁宗上书放粮救灾，老百姓深受其惠，颂声载道。

这年，恰逢包拯六十大寿，皇上念他居官清廉，诚心为他做寿。包拯无奈，告诫全家不准收贺礼。不料第一家送寿礼的竟是钦差六官司司礼太监，这下可把包拯的儿子包贵难坏了。万岁爷送给的礼谁敢不收，他拿出一张纸，请太监把送礼的理由写在上面，老太监在红纸上写了一首诗：

德高望重一品卿，
日夜操劳似魏征。
今日皇上把礼送，
拒礼门外理不能。

包贵看了看，让王朝呈送父亲，包拯见了即在原诗下面添了这样四句：

铁面无私丹心忠，
为官最怕叨念功。
操劳本是份内事，
拒礼为偶廉洁风。

老太监看过，闭口无言，只好带着礼物和那张红纸回京交差，皇上看了颇为赞赏。

老太监刚走，接着又来了一个头戴破帽、身穿破衫的送礼人。这个送礼人双手捧着一节嫩藕和一枝荷花，直奔包拯室内，包拯问他尊姓大名，来人说道：“俺叫赵钱孙李。”包拯诧异，那人解释说，俺姓赵，左邻姓钱，右邻姓孙，对门姓李，大家推俺来给大人送寿礼，俺的理由是：

花开花落不间断，
春来春去不相关。
但愿爷爷常健在，
多为百姓除赃官。

包拯双手接过礼物，笑着也说了四句诗：

赵钱孙李送贺礼，
礼产东湖民情意。
要学玉管通地理，
出水荷花不染泥。

(张宜举)